

文 | 周来聚

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抗大文工团



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简称抗大文工团），于1938年12月在延安组建，缪正心、杨恬、牛克伦、荏荪等先后任团长。当时大批知识青年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圣地延安，此时正是抗日军政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又是抗大总校第四期毕业的时候，所以抗大文工团的大部分成员是抗大总校各大队毕业学员中的文艺活动骨干。从1939年秋到1943年初，三年多时间，这支青年文化劲旅跟随抗大总校在太行山地区艰苦转战，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紧密配合党的斗争任务，用话剧、京剧、活报剧、歌舞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既宣传了战时党的方针政策，又活跃了军队与地方的文化生活，对于鼓舞全民抗战斗志，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奉命东进晋察冀

193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抗大移到晋东南办校的决定。随即，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令先头部队向晋东南长治一带挺进，后因黄河水上涨阻道，加之晋东南局势不稳，改道晋察冀边区。8月初，抗大文工团团长杨恬率五十多名团员和工勤人员，随总校三梯队从延安出发。翻山越岭，穿

过敌后日伪据点林立的地区以及严密封锁的同蒲铁路线，历时两个半月，行程2500余里，经三省25县，到达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县附近的陈庄、麒麟园一带村庄。

同年10月，抗大总校暂时在陈庄休整。抗大文工团抓紧时间编排新的剧目，创作并演出了反映抗大胜利突破敌人封锁线的话剧《同蒲快车》《破草鞋》和颂扬115师平型关歼灭战的京剧《大战平型关》等。

1940年元旦，抗大总校完成第五期教学计

划，将 15 个学员连队的毕业生分配到晋察冀边区部队和晋绥边区 120 师部队，又将余下的 6 个学员连队转给当地的抗大二分校继续训练。总校队伍大大精减，为挺进晋东南作好了准备。2 月初，晋东南地区局势好转，文工团便随总校从陈庄一带出发，冒着料峭春寒，在聂荣臻、吕正操二位将军率部护送下，在井陉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太行山西边的和顺县皋落、松烟，经过辽县拐儿镇、麻田、桐峪，于 26 日到达靠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的武乡县洪水、蟠龙地区。



艰难转战晋东南

1940 年 4 月，抗大总校第六期在蟠龙镇开学。朱德、彭德怀出席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明确指示抗大就是创造铁军骨干的学校。这是文工团成立以来全体团员第一次听到我军最高首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6 月，抗大总校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培养“党的铁军”的教学方案。

总校政治部要求文工团配合教学中心任务，编演一些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同时，为粉碎国民党顽固军队向太南抗日根据地进攻，编演一些反顽斗争的节目。

抗大总校深入敌后办校，虽然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但在敌后要经常对付日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军队的骚扰，流动性很大。进入晋东南太行区的八个月中，总校校部共进行了三次转移，第一次转移到武乡蟠龙一带；第二次转移到黎城西井镇一带；第三次转移到河北邢台浆水镇。文工团和各连队学员一样，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转移。

1940 年 11 月初，抗大总校从战火纷飞的晋东南地区出发，以“八路

军青年抗日纵队”番号（简称青纵）进入浆水地区。校部驻前南峪，政治部驻浆水镇，供给处驻河东村，各学员连队分驻在周围 20 多个村庄。文工团人员随政治部住在浆水镇东北山坡上群众家里。

浆水地区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西有巍峨的太行山，东有平坦的冀南大平原。在军事形势上，南为太行六分区驻地，北有太行一分区驻守，是八路军 129 师在河北开辟的最早的抗日根据地。此时正是农历九月中旬，浆水清澈的河水奔流不息，岸边的庄稼正在收割，四周沟坡上到处是挂满果实的柿树、青翠的松柏、火红的黄栌，如世外桃源一般。此时，杨恬在培训学习后调离文工团，总校政治部任命牛克伦为文工团团长。牛克伦带领团员们帮助房东收秋种麦，采摘柿子、黑枣、酸枣等林产品。为了过冬御寒，房东将团员住房的门窗进行了修缮。为解决冬季烤火用柴，团长派分管后勤事务的班长带几个十三四岁的小战士去深山老林砍柴，不料第二天小战士的身上肿得都穿不上衣服。大家都没见过这种怪病，下山找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老人说这是漆中毒，煮了一些绿豆汤叫战士们喝下，战士们很快就脱离了危险。



创作演出的丰收年

1941 年 1 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面对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抗大总校政治部指示文工团：认真学习理解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针对各个时期局势变化及所采取的对策，抓紧编排与时事结合紧密的剧目与节目。根据政治部下达的工作任务，这群战斗在敌后的热血青年，

决心要以战斗部队的姿态，克服种种困难，把手中的笔变做刀枪，高质量完成编演任务。全团议定，不论职务高低、演技分工，人人都要动笔创作剧目歌曲，既当编剧，又当导演和演员，这样既解决了人员不足的问题，又使每个团员得到各方面的锻炼。为了把好文艺作品质量关，团里还成立了编审委员会，由各编演组长和指导员组成。文工团还动员一些学者教授及其他专业人员，参加编审剧目讨论。如校部研究室主任徐懋庸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理论界的知名学者、教授，翻译过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文工团请他对剧本和节目进行审查，他感到很荣幸，先后数次提出不少重要修改意见。文工团编审委员会根据剧目人物的特点，在本团没有合适人选时，多次到外单位求援，如女生队副指导员郝治平（后为罗瑞卿夫人），一大队助理军医李鸣都数次参加文工团的剧目演出。

由于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当地群众所交军粮远远不能满足“青纵” 2000 多人的需要。各单位的人必须按供给处联系的地点，轮流到几十里外的山西和顺县去背粮，而且全校还掀起了开荒种菜运动，人人动手，自食其力。文工团在编演中遇到很多困难，除缺少布匹、粮食、油盐等生活用品外，笔墨纸张也极为紧缺。背粮背柴时，不少团员为了完成编演任务，搞一块小牌子，用锅底黑刷黑，将剧目提纲写在上面，因都是羊肠小道，就将小牌子挂在前边人的背上（自己背着粮袋也挂着别人的牌子），边走边思考，打好腹稿，到休息时啃着窝窝头，拿出“珍贵”的铅笔头，将内容写在草纸本子上。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文工团还是创作出 20 多个剧目，其中主要有方明创作的揭露大后方国民党特务迫害学校教师和学生罪行的话剧《青天白日》；苏明、张富强创作的反对买卖婚姻为内容的两幕话剧《凤凰》；李蒙等人编写的配合扩军、征粮、大生产运动等中心工作的话剧《参军曲》

《救国公粮》；何方等创作的反映百团大战中根据地群众支援部队进行破袭战的话剧《投奔前线》《洪岭战斗》《路》等等，在抗大和社会上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为了宣传我党的优俘政策，进一步瓦解敌军侵略意志，陈再、夏沙在两位被俘的日文教员（已参加反战同盟）山本和吉田的帮助下，还创作了反映日本军官厌战为内容的话剧《最后的战争》《石井一郎》。可以说，1941年是文工团创作剧目最多、演出任务最繁重的一年。

大力提高艺术水平

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对文工团的工作非常关心，在总结一季度工作时，他到文工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肯定文工团工作的同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浆水地区的环境比较安定，各部门都在制定正规化教育方案，文工团也不能落后，不要满足为娱乐而娱乐的做法，你们多在二十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的时期，既要把握好服务方向，又要在提高艺术水平上下功夫。要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编演有针对性、思想性的剧目，每个人在艺术水平上都要上新台阶。

张际春的讲话，对全体人员启示很大，从团长、组长、指导员到团员，人人都作自我检讨，在思想上行动上找差距。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编演反映“皖南事变”的几个节目政治内容不够深刻，在社会上反响不大，如果利用传统京剧采取借古讽今的方式，既能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妥协投降的实质，又能宣传我党坚持抗战的政策。史若虚提出依据宋朝民族英雄岳飞被害死的情节，创作历史剧，并和京剧组的江涛、关度共同研究了主题思想。史若虚坚持几个昼夜创作，剧本终于脱稿，交编审委员会审查，稍加修改后定名为《亡

宋鉴》。在排练时，史若虚自告奋勇饰演岳飞。团里认为，他身材气质颇有文武老生将帅的风度，适合岳飞角色人选。其他人物，如岳云由李佑民扮演、牛皋由吕班扮演、金兀术由李蒙扮演、秦桧由苏里扮演。从金兀术和哈密蚩密谋贿赂策反秦桧开始，到风波亭杀害岳飞为止。这时，总校正开党代会，文工团便为与会代表、抗大师生和浆水群众做首场演出。在演到岳飞接到十二道金牌执意进京、牛皋极力劝阻时，史若虚和吕班辩论异常激烈，演到父老乡亲在长亭为岳飞斟酒送别时，史若虚流着眼泪，唱着二簧散板，曲调悲凉、凄怆，感情深沉压抑，深刻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抗金英雄的崇敬与不舍的心情。看戏的党代表、总校领导和直属队机关的战友和浆水的居民，深深地为剧情所感染，有的热泪盈眶，有的泣不成声。联系当时发生的“皖南事变”，更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无比愤慨。

到八路军总部演出

《亡宋鉴》首次演出成功，受到观众的高度赞扬。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对该剧的内容及艺术形式给予了充分肯定。驻在辽县桐峪镇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知道《亡宋鉴》演出情况后，立即调文工团前去演出。文工团员便携带背包和道具，跋山涉水，行走两日到达桐峪镇，当晚就在政治部大院外的戏台上，为总部直属队演出。观众无不为演出的情节所感动。罗瑞卿称赞《亡宋鉴》剧本写得深刻，表演生动，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实质。指出以京剧形式借古讽今，反映现实，配合斗争形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抗大文工团还是创举。文工团到386旅部队驻地进行演出时，陈赓旅长与参加演出的文工团员合影，并帮助解决照明用的气灯、幕布。文工

团在返回总校驻地时，还到129师野战医院进行慰问，为医院伤病员进行演出。德国援华抗日的医学博士汉斯·米勒跟随129师转战南北，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了大批伤病员，他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曾受到邓小平等首长的高度赞扬。米勒对文工团演出非常满意，并与牛克伦用外语会话结为朋友。演出结束之后，米勒十分高兴，当即在牛的记录本上签字留念，写下了“衷心感谢您让我在前线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为了便于到外地演出，文工团还特别设计了轻便的活动舞台，不论是山坡、沙滩或村庄，只要有一二十平米的地方，就可在45分钟内搭起舞台，十几分钟便可拆除，后来演出时挂起幕布，点上气灯，加上彩色照明，比起城市戏院都不逊色。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召开，抗大文工团为这次盛会演出了许多剧目，压轴戏就是《亡宋鉴》。当时国民党还不愿改变他的两面政策，即一面虽然抗日，一面仍然反共。看戏的参议员都是有文化、有代表性的各界人士，他们边看边流泪，纷纷斥责顽固派制造了许多罪恶事件，表示支持共产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战到底的主张。

为抗大五周年校庆演出

抗大总校五周年校庆大会要开七天，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部队首长均出席会议。校庆露天会场就布置在前南峪村边的河滩里，有五个晚上的时间由文工团使用主席台进行文艺演出。各编演组将几年来所创作的作品进行梳理，利用此机会，全部向大会献出。校部公布了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模范干部和优秀学员名单，其中文工团有牛克伦、吕班、荏荪、张桐、何方、史若虚。总校决定要全面总结抗大（下转58页）

部的鼓励支持下，报社的文艺爱好者成立了一个“业余”的文艺组织“铁骑社”，并出版了刊物《铁骑》，顾宁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却给予了不少帮助与支持。多少个夜晚，顾宁认真地讲述他对稿件的意见：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文艺，不仅像长河岸边的梨花，更要像滦河里的浪花。不但要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要使人们的情感卷进这浪花中来等等。同志们按照顾宁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重写，《铁骑》印出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后来，在铁骑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冀东全区的文化、文艺性的群众组织“新长城社”，并出版刊物《新长城》，成为报社对冀东地区群众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宁担任主编。

1944年春，顾宁被调到冀东十五分区担任《救国报》南山版主编，仅仅到任一个多月，就在丰润白官屯战斗中牺牲了。新闻前辈邓拓同志为之撰写的《祭军城》首句为“朝晖起处君何在”，正是选用了顾宁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的话“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是青春洋溢，亦是痛断肝肠。牺牲这一年，他年仅25岁。

铁笔刻就的诗文

付惠轩，曾化名布于，1912年出生

(上接54页)创办五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写出长达40余万字的《抗大五年来工作经验》一书；其次是将校庆的各种文件、盛况汇编《抗大五周年纪念大会特辑》；三是将抗大创作的文艺作品汇编《抗大五年来文艺作品选辑》。此书将文工团所编演的剧目、歌曲、诗词以及驻地党政军民对文艺作品的反映尽收书中，于1941年8月由《新华日报》(华北版)印刷厂排版印刷。

1942年，根据形势的变化，文工团还排演了曹禺的话剧《雷雨》，当时

于河北丰润县大安乐庄，毕业于昌黎汇文中学，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夏天，他和陈大远一起来到鲁家峪根据地担任《救国报》编辑。他曾做过小学教师，诗文俱佳、才华横溢，是报社同志们公认的才子。

付惠轩擅长书法，写得一手“郑文公碑”的好字，他最先是在《救国报》任刻写员，为报纸刻写蜡纸，他刻写的蜡纸也保持了“郑文公碑”优美刚劲的特点，社长马宗周对他刻写的蜡纸大加赞赏。称赞他的字有着“郑文公的基础，加上艺术化的规范，使得小小的油印报纸变成为十足的艺术品”。加上他写的韵文跌宕有致，通俗易懂，并且有着强烈的战斗性，适合《老百姓》报的风格，付惠轩很快成了《老百姓》报的编辑。

《老百姓》也是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是针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要求而创办，成为《救国报》的延伸与补充。《老百姓》报的栏目很多，有时事解说、时势评介、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歌曲、漫画、连环画等，内容丰富多彩。付惠轩总是深入群众之中采集素材，并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加以表现。《老百姓》报的出版，受到广大抗日群众的欢迎，尤其是村干部都把这张通俗报纸作为向群众讲解时事、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蓝本，鼓舞群众斗志的教材。

在《冀东报史资料》第四辑，收

何方饰周朴园，莅荪饰周萍，吴因饰周冲，苏里饰鲁贵，罗炎饰鲁侍萍，武兆堤饰鲁大海，苏明饰四凤，唯独蘩漪一角无合适人选，经剧组讨论选调医助李鸣饰演蘩漪，结果效果很好。同时文工团还改编排演了鲁迅的《阿Q正传》、高尔基的《母亲》等名作，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侵华日军在华北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失败后，于1942年5月中旬出动25000兵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及129师直属队和抗

录了陈大远的回忆文章《鲜花写就的散文》，对付惠轩有着这样的描述：“布于同志有一个特点，写文章不怕干扰。他可以在人声嘈杂之中编报，可以在炮火中写稿，有时在儿童嬉戏的果树丛中工作，有时面对敌人在火石洞中构思。甚至他可以一面做文章一面同周围的人们讨论敌情，商讨对策，而他的稿子却从来不会发生任何疏忽和差错。”可见，艰苦的斗争环境磨练出他的睿智与练达，显示出“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沉稳风采。

1942年5月，付惠轩牺牲在丰润县腰带山的妈妈洞。可是他背着自做的装满采访稿件的蓝布口袋，行走在山路上的身影，战友们脑海中依然记忆深刻。和马宗周、吕光、顾宁、付惠轩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还有尹铭钰、冯国玺等许多《救国报》同志。

这些被日军惊叹为“文化八路”的英雄战士，以笔墨做武器，发挥着像地雷、机枪一样厉害的威力，有力地配合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们及时、迅捷地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把报纸办成党的喉舌和打击敌人的新闻利器；他们大力推动了抗敌文化工作的开展，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情深；他们不仅不断唤醒和鼓舞人民的信心与斗志，而且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着抗日救国的凯歌，用一腔热血浸染鲜红的抗日战旗。他们的生与死都在诠释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理应弘扬、传承的伟大的抗战精神。■

大总校。根据严峻的形势，为避免大的损失，总校首长部署：各单位除留少数同志在驻地组织群众上山隐蔽就地游击外，各大队和校直机关按预先规定的方向，根据敌情、地形化整为零，选择适当时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战过程中，抗大大部分同志胜利突围，但仍有部分人员未跳出敌人的合击圈而英勇牺牲。

1943年1月24日，根据党中央决定，抗大文工团随抗大总校1000多名教职员，冒着“三九”严寒，履冰踏雪返回陕北。■